

解读伟大旗手
讳莫如深的
内心之谜

鲁迅研究至今60年，如何解读鲁迅，仍是难题。非为尊者讳不可？

《野草》的旨趣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倾诉包办婚姻造成的性压抑苦闷。

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他的包办婚姻有什么内在联系？

XIN FA XIAN DE LU XUN

新发现的鲁迅

邹范平 · 著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新发现的鲁迅

——读几本鲁迅著作的札记

邹范平·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发现的鲁迅：读几本鲁迅著作的札记/邹范平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11

ISBN 7-207-06827-1

I. 新… II. 邹… III. 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5045 号

责任编辑：汤克白

装帧设计：天水碧

插图：邹楚弓

新发现的鲁迅：读几本鲁迅著作的札记
邹范平 著

出版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1

字 数 275000

印 数 1—4000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827-1/I·913

定价：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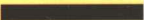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作者自述

少年读鲁迅，在文革热火之中，百花凋零，而一枝独秀。鲁迅隐藏在耀眼的光辉后面，正如珍珠放在华贵的宝匣之中，买椟还珠在所难免，读鲁迅只是打下了国文基础而已。

青年读鲁迅，正是西方心理分析学说输入之时，以此分析鲁迅，有柳暗花明之感，乃油然而生出一种责任感。

如今读鲁迅，与冷风寒月之中更上一层楼，想起鲁迅的一句话：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野草虽是泛称，却有具体的品种，鲁迅在《野草》的最后一篇点出“野草”即是“野薊”，意在告诉读者，他追求爱情即是对社会叛逆；同时他也要刺得“正人君子”们不舒服。野薊草有大小之分，两个品种都有同一个特点：带刺儿。俗称“刺儿草”、“戳人草”。叶固然是硬刺如坚针，连花都带刺，干燥以后尤其刺手。笔者每于秋日登山，常常见到一些野薊草，以手触之，感觉像触到刺猬一样，因此对《野草》之象征有所解悟。

责任编辑：汤克白

封面设计： 天水碧
www.tsb.cn

内 容 简 介

《新发现的鲁迅》从人性(食色性也)的视角切入鲁迅的内心世界的最深处,探索鲁迅思想的“地火在地下运行”的轨迹。本书简略地分析了鲁迅《野草》、《狂人日记》、《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娜拉走后怎样》、《写在〈坟〉后面》等文中隐密的鲁迅的潜意识(性压抑)和潜台词(对改变自己包办婚姻的思考,对爱情的渴望和对妻子朱安的忏悔);本书重点分析了《野草》这本小册子。

笔者认为,《野草》绝大部分的文章都与鲁迅的包办婚姻的痛苦有关,由于有所顾虑而“难于直说”,就用曲笔表达,鲁迅是很善于运用曲笔的,这对于理解鲁迅著作的原意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又由于中国向来有“为尊者讳”的文化传统,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就不可避免的制造了大量的盲点。要想全面正确地理解鲁迅,非得突破这两项障碍不可,否则鲁迅研究——借用鲁迅的表达方式——也只好处在“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歧路上。本书只是开在鲁迅研究的歧路边上的一朵小花。

前言

许广平说，她看到了周作人给鲁迅的信之后，再来读鲁迅的日记，就“如同把天书读通了”（《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笔者以为，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也是“天书”，至今尚未被读通。《野草》这本小书一向被视为难于索解，乃至许多分析《野草》的文章都与鲁迅的意思不大沾边，而又无可奈何。鲁迅曾说：《野草》“这二十多篇小品，……大抵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词就很含糊了。”《呐喊》与《彷徨》中的几篇小说也是如此。鲁迅善于把个人的痛苦加以抽象变形，这正如他有时候在文字上搞“解构主义”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关键在于把鲁迅反抗包办婚姻的意思认识到了，“天书”也就读通了。然而至今这些措词含糊之处大多尚未解开，为什么呢？是“为尊者讳”制造了鲁迅研究的大量盲点。有什么要讳呢？主要是讳鲁迅的包办婚姻。这既是他自己的心病，也是鲁迅研究者的困扰。有人说鲁迅在文章、书信、日记中，极少提到“她”——“妻”字之讳。鲁迅是文学家，“她”不反映到鲁迅的作品中是不可想象的，只不过鲁迅的文章多以曲笔提到“她”而已，既然要“为尊者讳”，自然就看不懂“她”在何处了。不理解包办婚姻在鲁迅生命中的意义，读鲁迅的一些文章和小说，就如读“天书”一样，永远也读不懂。

如果说鲁迅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鲁迅的伟大未能被人充分认识和理解也是毋庸置疑的。对鲁迅伟大之处的未充分理解包括两层含义：首先是事实上的含混不清，其次是意义不明朗，也就是不懂。鲁迅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这话虽然是针对《儒林外史》说的，对于鲁迅自己，他一定也有同样的遗憾与悲哀吧。明明是伟大之处，却以为是缺陷。因为对于鲁迅的伟大不懂，就把鲁迅改造成自己能懂的鲁迅，即所谓“我们心中的鲁迅”，这当然不是真正的鲁迅了。不同的人都各有自己“心中的鲁迅”，为此就难免要起争执——如果形



势允许的话，就公开辩论。有人说，鲁迅先生早已逝世，其生前，祸福荣辱尚且无暇顾及，死后又何复计较？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他身上争来争去，无非是争“现在”，争活人的事情。然而鲁迅对于生前的祸福荣辱何曾无暇顾及？不也曾写过《死后》一文，“计较”死后之事吗？而且“过去”的事情我们也未必都“考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也有一些为尊者讳之处不能明了。如果把事实及其意义搞清楚了，鲁迅先生未被人们理解的伟大之处，也就彰显出来了。

鲁迅研究已经进行半个多世纪了，专家之作汗牛充栋，难道真的还有可“考据”的空间吗？笔者并非鲁迅所说的“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阿Q正传·序》），也没有那种特权，考据是无从做起的。笔者仅把最近找到的几本鲁迅研究的著作，首先是外国书：日本学者竹内好的《鲁迅》（《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版）和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思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加拿大学者李天明的《难于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还有中国书：萧文邦的《鲁迅新传》（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林贤治的《一个人的爱与死》（《重读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进行比较和分析，把专家们考据时忽视地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再加以考察和认识而已。时代变了，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研究方向加以考察和认识的观点有时候也可能被容忍，未必一律都被封杀。笔者在专家们的研究方向之外，又一走了一条新路，这新路并非如王安石批评程子理学之所谓的“如壁上行”，而是由壁上走下来之后的一条坦途。由此解决了鲁迅研究中的一些困难。

现在我把读这几本书之后的摘记和感想发表出来，与喜爱鲁迅著作的朋友们共同分享。

目 录

- 1 / 多读外国书
- 14 / 鲁迅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
- 30 / 鲁迅弃医从文更深层的原因
- 40 / 爱的寂寞如大毒蛇
- 49 / “非存在”的婚姻与自由之“苦恼”
- 68 / 狂人无意间吃了谁的肉？
- 81 / 兄弟失和的原因
- 93 / 由“陪着做一世牺牲”到“我可以爱”
- 107 / 鲁迅为何仇猫？
- 116 / 绝望中的希望——《题辞》分析
- 125 / 枣树与小红花的梦——《秋夜》分析
- 133 / 哀婉的幽怨——《影的告别》分析
- 145 / 鲁迅向谁求乞？——《求乞者》分析
- 154 / “由她去罢”——《我的失恋》分析
- 161 / 与软刀子的对峙——《复仇》分析
- 167 / 觉醒者被庸众吃掉——《复仇(其二)》分析
- 171 / 婚外的青春固在——《希望》分析





- 179 / 冰雪中的性压抑——《雪》分析
- 188 / 鲁迅的忏悔——《风筝》分析
- 203 / 性幻觉的故事——《好的故事》分析
- 207 / 选择的痛苦——《过客》分析
- 228 / 永不息灭的爱欲之火——《死火》分析
- 237 / 不能对话——《狗的驳诘》分析
- 239 / 魔鬼的哀叹——《失掉的好地狱》分析
- 245 / “离开”家庭——《墓碣文》分析
- 250 / 为朱安的命运担忧
- 《颓败线的颤动》分析
- 259 / “你说便是你错”——《立论》分析
- 262 / 对朋友的失望——《死后》分析
- 273 / 与世人的战斗——《这样的战士》分析
- 276 / 没有希望的人
-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分析
- 279 / 对自由恋爱的疑虑——《腊叶》分析
- 287 / 纪念“未生者”——《淡淡的血痕中》分析
- 291 / 生存不能没有爱——《一觉》分析
- 300 / 心中的阴影——《一件小事》分析
- 308 / 鲁迅与朱安都是祥林嫂——《祝福》分析
- 315 / 以“食”代“色”——《娜拉走后怎样》分析
- 321 / 为死掉的婚姻迁葬——《在酒楼上》分析
- 326 / “我胜利了”——《孤独者》分析
- 334 / “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伤逝》分析
- 357 / 自我解剖——《写在〈坟〉后面》分析
- 373 / 几句结束语

多读外国书

鲁迅研究之广泛深入可谓上天入地，无微不至，好像没有新的土地可以开掘了。其实不然，在笔者看来，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处女地（称之为禁地也许更贴切）都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对于某些鲁迅研究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如今鲁迅研究的热点是论战史这类事情，有不少需要实事求是的工作要做。正如现代化的城市一律广种草坪，且草都是外国引进的一样，“时髦”的鲁迅研究也都是参照西方社会政治和思想模式来进行的。笔者也赶一回时髦，不过，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子。

笔者以为要想了解鲁迅的思想，就必须透彻理解鲁迅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及其产生的根源。

在《青年必读书》这篇文章中，鲁迅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不了什么大的事。”在鲁迅看来，读中国书的惟一好处就是能作文章。伊藤虎丸说：“他幼年和少年时代所受的传统教育，就像人们所公认的那样，构成了他出色文章的功底，但同时也可以说，他对古典传统的根本否定——就像他在回答报社的调查所说的那样：‘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也正是出于对少年时代沁骨入髓地接受传统教育的反



省。”^①我们在这里要问：鲁迅的“反省”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这个“反省”应该从自身找出一个充分的“出于”理由来，我们的认识才算是完成了。今天有许多人都从“救国”的角度找原因。这是不错的，这可以称之为从“公”的角度看问题，是中国书的一大特点，然而不全面，因为个人的原因被忽视了；外国书则不然，从“私”的角度看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外国书往往是从个人的私生活中去挖掘原因。这是笔者多读外国书的一点体会。

外国书有一种观点，认为后来的人评价历史人物往往只关注与某种预先设定的理论有关的事实，并且用这些事实来加强预设理论的正确性。而忽视了没有（或不符合）预设理论的那些事实。人的选择无处不在，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选择与预设理论相符的事实是经常的，选择事实的目的是为了再次印证预设理论，这是非科学的方法。而科学的方法则是以事实考验预设理论，发掘事实的目的不应该是用它来再次证实预设理论的。这种话非从外国书^②上读到，笔者是绝不敢妄议的。



2

伊藤虎丸在此处的预设理论就是中国的近代化就等同于西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顽强抵抗西化的。伊藤虎丸紧接着说：“如果进一步从思想和语言不可分割、语言就是思想本身这个角度来说，他后来在接触西方近代语言（学问、思想、文艺）时，能够以此前的民族语言（传统文化）为教养基础，不是恰好证明了他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语言）时，已经在自身当中以强有力的形态，具有着竹内好所说的‘抵抗’（坚守自我）的主体（民族语言）吗？我认为，在鲁迅那里，这一点作为传统与近代关系的前提条件是格外重要的。”隔了一段文字之后，伊藤虎丸又在《传统文化遗产的两重性》一节中接着说：

我以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应该称之为鲁迅的原体验和基础教养的东西，在他与西方近代文化接触以前，就已经

① 《鲁迅与日本人》的第二章：《鲁迅与西方思想相遇》的第一节《留日之前的鲁迅》第一小段《童年时代与传统文化教育》。

② 参阅英·卡尔·包勃尔《历史有意义吗？》。



形成了相当稳固的形态；而这些原体验和教养对他来说，则具有某种可称之为两重性的内涵。

也就是说，一般在把非西欧各国的近代化作为文化问题来考察时，中国或中国文学的最大特色，就是比其他国家更具有悠久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掘田善卫^①曾介绍了他出席亚非作家会议时的一个情况：非洲某个新兴独立国家的诗人，在谈到他的烦恼时说，他们虽以旺盛的独立热情致力于创造新的国民文学，但由于本国语言中缺少诗歌的语言传统和积淀，以致一写诗便只能用自己接受教育时所使用的法语来写。同这样的民族相比，中国近代文学的特征，就是作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罕见的例证，始终保持着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同一种语言（文明的同一性），具有承纳作为“西欧冲击”的西欧近代文学（语言）的悠久的文学传统，即坚实的语言土壤。

可以说，中国近代化的特征，就在于它沉重得不易容纳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欧近代，就在于它高傲的传统文化的“抵抗”之强（换句话说就是保守性）。而这份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堵阻碍近代化的几乎令人绝望的厚重的因袭之墙。由于两个方面难以分割地交错在一起，也就不是用“好”的遗产或“坏”的遗产所能简单地来区分的。

鲁迅幼年和少年时代的体验以及这一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传统文化遗产，同样也具有“两重性”，鲁迅的文学，如果没有这些遗产就难以确立。在回答“青年必读书”的调查时，鲁迅回答说，“不读中国书”。但有人反问道：“你不是读了很多中国古书吗？”对此，鲁迅的回答是：“我自己因此是受了怎样的苦啊！”我所说的鲁迅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也许就是他和民族文化传统上的这种难解难分的“两重性”进行奋斗的足迹。

^① 生于1918年，日本战后派小说家。1942年庆应大学法文科毕业。1945年被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派遣来上海，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宣传部征用，1947年回国。从滞留上海期间起，创作了一系列批判战争的作品。



伊藤虎丸的意思是，如果不曾读过中国书，一张白纸，没有负担，“两重性”难题也就不存在了。鲁迅从小就读了中国书，且“沁骨入髓”，所以现在很吃苦，必须经过一番“苦斗”，战胜自身的“两重性”。不过，伊藤虎丸所认识的“两重性”太肤浅，不过是为了证明中国必须全盘西化这一预设理论而已，根本没有落实到鲁迅个人的生活中，他并没有真正懂得鲁迅所说的他受的“苦”的涵义何在。这里只就困扰鲁迅的“两重性”难题之“苦”简单地说几句，首先是儒家的“孝”，这是对于母亲的，为了孝，接受了母亲为之包办的婚姻；其次是儒家的内省精神，鲁迅要追求爱情，自然会损害朱安，对妻子朱安的忏悔是鲁迅的最伤心并最伟大之处。林贤治说：“他深爱着他的母亲。/正是他所深爱的人送给他以一份无所可爱的礼物：朱安。命运的恶作剧。然而，这是不容违抗的，因为血脉是不容违抗的。或如他所说，她是一份‘遗产’，那么在接受这份遗产之前，他已先行接受另一笔更大的遗产——传统礼教——了。”林贤治也指出了鲁迅的“两重性”，他认为鲁迅是“观念的激进主义者，行动的保守主义者。”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两重性”才造成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彻底地否定态度。无论是“两重性”或是两份“遗产”之苦，归根结底都与性压抑有关，这是鲁迅生命中极重要的“一件小事”。详细的分析，留待后面再说。

后来鲁迅在厦门大学做教授时，受邀作了一次讲演，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的胡里胡涂。”（《两地书》）看来，要真正理解鲁迅，非理解并实践鲁迅的“不读中国书主义”不可，否则对于鲁迅的认识也只能是“胡里胡涂”。说实在话，鲁迅许多真实的思想人们并没读懂，鲁迅某些文章似乎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鲁迅某些文章很像李商隐的《无题》诗，意思恐怕只有鲁迅自己才懂，读者往往不知道鲁迅在说什么，正如那位尊孔的校长一样。某些人本来正是鲁迅所批评的那类糊涂人，只因为也反孔，就自称“我也姓鲁”了，其他

也反孔的“旁听人”对他们自然就“肃然的有些起敬了。”绝没有人“跳过去，给他一个嘴巴”，说：“你怎么会姓鲁！——你那里配姓鲁！”

鲁迅此处所谓的“外国书”应该是“日本和欧美书”才确切。因为当时只有日本和欧美国家的物质力量是强大的，文化是先进的。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性文化比较开放，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正受到质疑和破坏。自由恋爱逐渐风行，虽然也无非是为了金钱——请看巴尔扎克的小说——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某些外国书，如劳伦斯的小说则反映了更多的爱情，虽然不怎么体面，但是人性的光辉是耀眼的。此时，东方国家的性文化仍然是陈旧的，包办婚姻和“从一而终”的现像就使很多人都痛不欲生。不仅中国人如此，印度人也是如此。所以印度书就不在鲁迅所说的“外国书”之列。至于说到“国民性”，如果你真的多读外国书的话，就会发现，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人；狄更斯笔下的英国人；果戈里笔下的俄国人；卜伽丘笔下的意大利人或马克吐温笔下的美国人；甚至处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人和大叫钉死耶稣的犹太人，等等，都与中国人没有根本的区别，彼此彼此。鲁迅在论述“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时所举的例子就是外国人。鲁迅说：“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例：小事件则如 Cogol 的剧本《按查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这就是两个例子了，不知为何鲁迅却说是“一例”，这是鲁迅的思想比较难懂之一例。既然古今中外暴君臣民的人性皆一致，而特别强调中国人的“国民性”有问题，要改造，就伟大得狠了。

理解“不读中国书主义”并不难，这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实实在在地去读原著必有收获。重要的是读原著，而不要读那些“学贯中西”的学者阐述西方预设理论的文章，否则还是读中国书，而非读外国书。也不必多读，踏踏实实地读几本就有用。读了几本外国书，笔者有一个发现：与中国古人的“知人论世”略有不同的是，外国人还特别不忘“知人论性”。外国人研究品评人物，探寻思想根源，绝不会忽视研究对象的性生活，懂得这一点，也就抓住了人性的根本。不过，西方人看到的问题，中国古人也早就看到了。春秋时期的中国书

里就有“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说法。古人认为，人性主要就表现在这两个方面，由此入手观察社会人心，就洞若观火。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一文中把古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道理用自己的白话说出，然后就说：“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与上面把两例说成是“一例”一样，这也是鲁迅的思想非常难懂之又一例。不读中国书，古代“中国的旧见解”是否与外国书的见解相同就无从知道。中国古人或说东，或说西，并不一律，所谓一阴一阳，决不可能所有的古人都说东，或都说西。除非只有白天（阳）没有黑天（阴），或相反。中国书所谓“东西”，略相当于外国书所谓“存在”。而存在就是矛盾统一，能设想有“东”而无“西”的“存在”吗？如果大家意见本来就一致，皇帝何必要压迫舆论？中国书浩如烟海，绝不是一个人写的，见解当然就不一律。几千年来，写书的人太多，各人的见解不可能统一，一个人的见解，也可能前后不相同，而不问青红皂白将自由表达思想的中国书都付之一炬的秦始皇就只有那么一位。这样，中国文化就既保留了“东”也保留了“西”，也有一些中国书与外国书见解一致。当然，不读就不知道，不就等于没有吗？中国书有关性爱的内容其实并不少，如《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牡丹亭》中杜丽娘说：“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还有《西厢记》、《聊斋志异》、《红楼梦》……，不胜枚举。可是这些书就是不如《红与黑》、《红与白》描写性爱写得直白，敢于直面人生的主题——性欲，所以要多读，中国的书不直面人生主题，而且压制性欲，还是少读为妙。然而，中国古代，主要是明清时期，艳情小说泛滥成灾，是直接描写性欲的，鲁迅作为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专家，对此必然是了解的。当然，这些书都不是好书，更不要读。

近现代西方人不讳言性，论人必谈性；近现代中国人比较忌讳，但也不是特别忌讳；建国以后的中国人却特别忌讳谈性，尤其是评论中国伟人的中国书，无不讳莫如深，以免获“大不敬”之罪。鲁迅研究尤其是如此。老一代的鲁迅研究者绝不在此事上纠缠，光想一想这件事就会被认为是在亵渎鲁迅，令人心出汗。以至于普通读者，都

不知道鲁迅曾有过一场包办婚姻。即使是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往往也只是在借鉴西方的新词妙语或创造新概念汉语方面下功夫,仍然不太敢往人性方面探讨。但是,外国书告诉我们,非从人性入手,就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一个人。否则读了外国书,连分析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不行,还如何“行”?又如何“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呢?

老一代的鲁迅研究者中,冯雪峰算是比较理解鲁迅的,他在《论〈野草〉》一文中说,《野草》是反映鲁迅内心矛盾的。这只是轻轻点到为止,后来冯雪峰大倒其霉,但也没立即死掉,如果他把鲁迅的“内心矛盾”说明白了,必惨死无疑。在新一代的外国鲁迅研究者中,加拿大人李天明的《难于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是从“人之子”的人性入手,把鲁迅作为真实的人,而非超现实的神来研究的。李天明毕竟是可以中文写书的外国人,能够理解并可以把鲁迅的内心矛盾揭示出来。这本外国书只是一个开头,还有“接着说”的必要,笔者不过是“接着说”而已。日本人竹内好对于鲁迅传记的疑问、以及鲁迅思想的形成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是没有解答。伊藤虎丸也提出了鲁迅自省的问题,顺着他们的思路研究下去,就可以发现一个新的鲁迅。萧文邦的《鲁迅新传》为人们提供了许多真实的资料,非常可贵。在此基础上认识鲁迅的潜意识,就比较有把握了。因为文章触及了鲁迅研究的一些盲点,故名之曰《新发现的鲁迅》。除了《野草》之外,鲁迅在多处都暗示了自己的“苦衷”。文章写出来了,当然希望有人能读懂,可是人们偏偏不敢读懂,不敢理解,这对于鲁迅也是不公平的。当然肯定会有人以为,这种研究是犯了“大不敬”罪(在以前是该杀头或者该流放的)。这说明人们的思想还没有真正的改革开放(如今人们的思想只有在搞原始积累这一点上是真开放)。鲁迅研究领域一旦改革开放,就可以发现许多阳光照不到的盲点。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书中最时髦的是心理分析书。弗洛伊德最时髦,议论性压抑对人性的扭曲的文章最能振聋发聩。从这些外国书里,我们知道,性压抑的问题必然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当西方新的性文化传入中国时,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但是却被人们故意掩盖